

回归学术主体性: 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

陈支平

摘 要: 中国东南地区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 具有一些与西南、西北、北方各地少数民族所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学者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特征的时候, 往往存在三个值得省思的问题。一是文化的边缘心态, 即预设东南地区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基本上是从北方中原传统过来的, 从而对东南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产生许多偏颇甚至不切实际的负面作用。二是历史与现实的偏离。历史文献及“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常常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我们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民族史的时候, 假如过于执著于历史文献的记述和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 恐怕都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入比较偏颇的学术困境。三是民族学的政治性导向。如果过分强调不同民族的自我表现及其特殊性, 势必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政治性导向的正确路线, 是应该发扬中国传统中的民族大融合的趋向, 而不是刻意强调甚至制造不同民族的自我意识。

关键词: 东南; 民族史; 研究省思

从目前中国各民族的分布来看, 中国东南地区所聚居的少数民族人数相对少些。虽然从族别上讲, 除了大部分为汉族之外, 较成规模的有畲族、高山族、回族、满族、蒙古族等, 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整体数量终究有限, 并且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处, 相互往来密切, 影响亦深。正因为处于这样的状态中, 使得中国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具有一些与西南、西北、北方各地少数民族所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 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东南民族历史研究时所必须认真记取、高度重视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 当学者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特征的时候, 往往受到某些价值判断及思维定式的影响, 使得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学术的主体性。在当今文化多元化趋向日益显现的背景下, 我们对于以往东南民族研究中所出现的某些偏离学术主体性的问题进行省思, 应该不无学术意义。

一、文化的边缘心态

这种文化心态的形成, 其始作俑者实际上是汉族。先秦时代, 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百越民族。秦汉之后, 北方汉民族逐渐南迁, 最终后来居上, 成了东南地区的主要民族。北方汉民族的南迁, 一方面给东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 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 另一方

面, 也在这一代代的汉民后裔的文化意识中, 积累了向往北方汉民族核心的牢固意识。再加上长期以来北方南迁汉民在东南地区的繁衍生息、兴衰存亡的艰难历程, 促使这里的汉民形成了攀附中原世家望族的社会风气。于是, 向往中原核心的文化边缘心态便在东南地区的汉民族意识中世代相传、牢不可破。

随着北方南迁的汉民在东南地区迅速蔓延并且取得主控权之后, 残留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畲族、蛋民, 以及唐宋以后从波斯海地区东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 逐渐受到汉民的影响以及其生活环境的需求, 也不得不把自己的祖先, 攀附在中原汉民的世家望族之上。我们现在所阅读到的东南地区畲族、回族的族谱, 虽然其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他们自己族源追溯的某些特征, 但是从始祖的塑造上, 则是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与汉族共同的祖先。^① 似乎他们所追溯的祖先, 不是身处其间的东南区域的百越先祖或远在中东的波斯回归, 而是处于华夏核心的中原地区。

这种边缘文化心态延续至今, 以致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一个预设的文化前提之中, 这就是东南地区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基本上是从北方中原传统过来的。

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民族及其文化, 首先要

*作者简介: 陈支平,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教授 (福建 厦门, 361005)。

①参见陈支平《福建族谱》,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关注北方中原核心文化对于东南边缘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承。这种学术思考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毕竟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里,中原文化确实对于南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假如我们把所有的学术注意力都放在中原文化对于南方文化的单线传承之上,无疑对于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形成发展的真实历程,将起到过犹不及的偏颇效果。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现在东南地区的一些家族史研究,对于族谱资料的执著,不少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人们根据自家族谱的记载,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是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研究中国汉族史的学者都知道,即使是中原的汉族,也早已不存在所谓纯正的血统了。中国的汉族是经过多民族的长期融合而形成的。更不用说中国东南地区的汉族,除了其北方先祖多民族的融合血统之外,来到南方之后,与当地土著、阿拉伯人后裔的血缘融合也不在少数。所谓的“最纯正的汉族血统”,显然极不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真实历史。不但一些汉民家族史的研究者如此,即使是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史的研究者,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譬如东南地区的蓝氏家族,往往是畲族的后代。但是由于族谱已经把自己的族源塑造造成中原望族的后裔,致使今天的一些蓝姓的族人特别是那些迁移到台湾的蓝姓族人,很难接受他们是少数民族的身份,从而形成了他们在福建的祖家是少数民族畲族而在台湾是汉族的奇怪现象。

二是关于东南地区地方方言的研究,所有的研究者们几乎都是从现在的东南方言是从北方移植过来的这一前提作为出发点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其结果是不论是那种方言,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全部是:我们的方言保存了最丰富的上古、中古时期中原的古音;中原古音在中原已经逐渐消失,我们的方言是中原古音的活化石,诸如此类。研究结论上的雷同,本身就失去了学术上的创新意义。试问既然如此,我们现在身处东南地区的某一个方言区,为什么还是不容易听懂相邻的其他东南方言呢?其实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北方语言作为政治核心的语言,对于南方新开发区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原先流传在南方各地的地方语言,同样也在现在的东南方言中被部分地传承了下来。^① 我们曾经考察东南区域

“客家”族群的方言,发现其语言特征与其他汉民方言区的语言差异甚大,反而跟少数民族的畲族语言,却又诸多相通之处,甚至于可以相互交流。这种状况,更说明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地方语言对于东南汉民方言的相互传承作用。因此,一味地预设文化核心与边缘区域的单线传承前提,就不能不对东南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产生许多偏颇甚至不切实际的负面作用。

二、历史与现实的偏离

我们了解了中国东南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边缘心态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东南地区民族发展历程中,其真实的历史与现实是存在着相当的差距的。

历史学家注重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而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则较侧重于来自于田野工作中的所谓“历史的集体记忆”。然而,不管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历史的集体记忆”,其创作者的文化意识才是最终决定这些文献资料及田野资料的真正主体。当历史文献与“历史的集体记忆”的创作者在自己的文化潜意识中已经有了某种文化的价值判断取向的时候,其所创作出来的历史文化表象及“历史的集体记忆”表象,毫无疑问就有了相当明显的自我取向性。这样创作出来的历史文献及“历史的集体记忆”自然也就和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

同样举两个例子。一是关于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许多客家研究者,特别是本身就是客家一分子的客家研究者,往往在自己的脑子里形成了客家是正统的来自中原土民的后裔的文化意识。那么由此而创作出来的客家祖谱、客家宗祠、客家文艺作品、客家民间传说等一系列的客家文化表现形式,都将围绕着这个文化意识而展开。我们阅读这些文献记载,当然可以得出客家民系是源自正统中原汉族土民的结论。可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进一步探究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则可发现,所谓的“客家”民系与东南区域的其他汉民民系并无太大的差异。而且,在现在客家民系的构成中,当地土著的融入也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最近几年来一部分严肃的研究者们的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② 但是这种历史事实一时恐怕还很难让痴迷于客家正统中原汉族土民论者所接受。

根据客家是来自正统的中原土民的后裔的文

^①参见邓晓华《福建境内的闽、客族群及畲族的语言文化关系比较》,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24卷1号,2003年。

^②参见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化意识，人们创作了客家人南迁时驻足闽西宁化石壁村的传说。这种传说，或者说是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在早期的客家文献中是很难找到比较确切的证据的。即使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首先系统创造客家是正统的来自中原土民的后裔这一论点的罗香林先生，也对这一传说抱着存疑的态度。^①但是到了20世纪末，一些客家籍的成功人士，索性在宁化县石壁村大兴土木，修建了所谓的客家百姓大祠堂。后续的许多客家祖谱，也纷纷把自己祖先的活动路线，千方百计地到宁化石壁村转一转。如此一来，新的历史事实就这样被创作了出来。

这些年来，政府注重区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准备在国内的一些区域内，设立区域文化保护区，例如安徽徽州区域文化，闽南区域文化，都率先被列入国家级的区域文化保护区名录。紧接着，客家区域也希望列入这一保护的范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划定客家区域的范围，却成了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情。一些原本与客家没有关系的地区，因为客家祖谱中描写祖先从某地某县经过迁移而来，既然是客家祖先驻足的地方，也就是客家区域了。因此这些地方的领导以及一些文化热心人士，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顺势被列入国家级的文化保护区之内。上级领导为了慎重起见，请了一些专家去论证。其结果可想而知，不同立场的所谓专家们吵得不可开交，莫衷一是。学术论证既然得不出结论，最后只能请领导出面来裁决了。

第二个例子是疍民。如果说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疍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我们从秦汉以迄宋明均可在历史文献中看到有关他们的某些记载。但是由于千余年来疍民都生活在江湖漂泊的木船上，与一般的汉民及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他们也曾被人们视为“贱民”一类。这给世代疍民的文化意识带来了长期的创伤，到了明清以来，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政府与社会承认他们是汉民，而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奇怪的族群。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民委开展民族识别的时候，他们一致请愿声称自己是汉族，千万不要把他们当做少数民族。政府顺乎舆情，宣布把他们当汉族看待。时至今日，这支货真价实的东南土著少数民族，从浙江沿海南下福建闽江、九龙江及其沿海，一直到珠江三角洲流域，却已经消失在汉族的大众之中。他们的历史，又能到哪里去寻找呢？在他们的“历史集体记忆”中，身为汉民变成了他们

永久的追寻。

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民族史的时候，假如过于执著于历史文献的记述和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恐怕都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入比较偏颇的学术困境。无论是民族史的学术探索，还是现实中的民族、族群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观察其中所隐藏的文化意识。特别是身处其中的文化意识的自我追寻与文化意识的自我认同，这才是我们在研究东南民族史时所应当高度重视的内在因素。

三、民族学的政治性导向

在20世纪以前，虽然说中国的东南地区生存着许多不同族属的民族，但是我们从历代政府的政策表述上，很难看到所谓“不同民族”的区分。在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观念里，普天之下的民众，其社会地位基本上是一致的。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政府户籍的民众，汉民也好，畚民也好，甚至于台湾地区的“生番”、“熟番”，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很少有在政策上的特别歧视条款。其实，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为优秀的传统，即几乎不存在民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问题。这种优秀传统本来是很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的。

20世纪以来，西风东渐，“民族”一词作为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含义被引进中国。在政治至上的国度里，“民族”的概念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方面的意义。特别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根据西方的民族理论按图索骥，从而形成了现在我们国家的民族分类格局。56个民族的界定与管理，完全纳入国家政治体制的范畴之内。

民族也好，种族也罢，无论古今中外，他们与政治的关系之不可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根据西方的理论划分56个民族，自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我一贯同意这样的观点：解读“民族”是一件费力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民族的围建边界纵横交错，构造因素多样复杂。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历史进程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用一种比较通俗化的语言表述：中国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与变迁，主要是受到“文化意识”和“自我表现”这两种基本要素的时代变迁的影响。某种强势的区域性“文化意识”或国家性“文化意识”，将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巨大的、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而不同少数民族间的“自我表现”，既有加强本族内部认同感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应对来自外部“文化意识”影响力

^①参见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

的本能反应。这两者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中国近现代民族社会的基本格局以及我们今天考察民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我们再来区域性地考察中国东南地区的民族发展历史。可以说，这一区域内的民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其他区域内的民族发展历程的最大差异，是这里受到国家性“文化意识”的影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到了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东南地区的汉民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所谓民族差异已经相当少了，大量的畚民为自己起了诸如陈、林、何等等的汉族姓氏，融入汉族的族群之中。^①在许多所谓少数民族民众的文化意识中，往往是把自己当做和汉民没有什么差别的群体或个体，甚至于完全就是汉民的一分子。这就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畚民的文化意识一样。

明清以来中国东南地区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差异性的淡化，从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向看，是十分正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政府把民族问题纳入政治体制的范畴之内，自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与积极性。但是，如果过分地强调各个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反而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与大团结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尤其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个地区的民族关系情景并不相同，以大一统的政治姿态来贯彻相同的民族政策，其所起到的效果并不一定能够尽如人意，甚至事与愿违。

仍以畚族言之。同样是畚族的血统，在政策的引导下，有的畚族成立了畚族乡、畚族村；有的则依旧是汉族归属，完全缺乏理论上的合理依据，给人一种政治及其政策操作上存在着某些随意性的感觉。有的少数民族如福建的回族，至少从明清以来就把自己家族打扮成汉族，修建与汉族同样的家族祠堂，撰写与汉族一样的家族族谱，祭祀崇拜与汉族同姓一样的汉族先祖，甚至与汉族的饮食习惯一样，牛肉、猪肉一块吃。但是遇到政府需要落实“民族政策”的时候，有些久已汉族化的族群又重新被人为地变回到了所谓的少数民族。如此落实的“民族政策”，是否真有其社会团结与国家和谐必要性？这种政治

性的导向不能不让我们从事民族学学术研究的人们举手无措，不知从何说起。

民族学的政治性导向在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台湾的少数民族是高山族，到了近现代，高山族中的“平埔族”，许多人已经融入汉民系统。即使是那些未融入汉民系统中的“原住民”，也在不同程度上与汉民产生了诸多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进党的刻意推动以及选举政治的影响下，台湾所谓“原住民”的民族特殊性得到空前的强调。于是，所谓“原住民”的族群分类，越来越多，先是9族，如今已有14族，据说还有在争取成为其他什么族的。从目前大陆和台湾一些少数民族强调其民族特殊性的“自我表现”形式上看，更多的是着眼于功利性的目标。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某些人过分渲染“原住民”、“南岛语族”概念，以及其他族群如“客家”族群的种种特殊性，自有其背后十分复杂的政治因素与功利因素，尤其是其中的某些“台独”用意是很值得警惕的。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大陆的某些民族政策的执行者和研究者们，竟然跟随着台湾的“原住民”政治性导向而起舞，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确定的56个民族中的“高山族”放置一边，指示今后中国大陆出版研究台湾高山族的论著，一概不能以“高山族”称呼，如此一来，我们今后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又将何以立足！假如今后台湾的选举政治派生出更多的所谓“民族”出来，原先的“平埔族”也跟着另树旗帜，各立以族，难道我们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数量，要增加至100多族了吗？

我认为，民族学的政治性导向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过分强调不同民族的自我表现及其特殊性，势必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政治性导向的正确路线，是应该发扬中国传统中的民族大融合的趋向，而不是刻意强调甚至制造不同民族的自我意识。这或许才是我们学术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 廖国强）

^①关于畚族改为汉族姓氏，可参见傅衣凌《畚族姓氏考》，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